

家書裡的歷史 曾國藩和他的湘軍

王之相

南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摘要

專業研究者之外，一般讀者對於歷史事件的認識，通常不是來自專業史書。但是若就專業史書而言，簡明的現代史可能是相對嚴謹的資訊來源。為理解歷史認知的真實模樣，本文以曾國藩和他的湘軍為主題，安排現代史、專門著作及曾國藩家書三個層次的歷史紀錄，交互呈現同一主題之不同面貌。家書之選擇被列為最底層歷史，是因為家書不同於公開文書，其中若干紀實可能與現代史或專書之間呈現不連續的現象，適可彌補、甚至修正前者過於凝鍊的印象。然而此一「三層閱讀」終究不是一般讀者在興趣及時間上可普遍進行的，所以「何謂歷史」之基本議題，對任一社會之大眾而言依舊構成問題。

關鍵詞：曾國藩、湘軍、家書、歷史



壹、問題的開始

廣西地處邊陲，距離北京非常遙遠，駐軍不多。清咸豐元年（1851），洪秀全率領大軍衝出廣西，一路從兩廣迂迴北上，不久竟佔領武漢，武漢的位置可是中國在地理上的中心，朝廷震驚不已。兩年之後，太平軍沿著長江順勢而下攻陷南京而在此建都為天京，正式立國。此時的太平天國已站穩東南半壁，同時派出兩支軍隊北上，一支進軍華中，另一支直撲北京。

太平天國起事以來，滿清正規軍已經完全無法阻擋它的攻勢，因而漢人才終於有了掌握兵權的機會。1852年湖南進士曾國藩自北京回鄉，把湖南的鄉勇團練進一步組織起來對抗太平軍；依賴這股被稱為「湘軍」的力量，清朝終於在1864年消滅了太平天國，前後歷時十四年血戰。由於原是八旗綠營正規軍體制以外的軍事單位，湘軍成為當時刻意編組而成的一種「新軍」¹，中國近代史頁上遂增加了一個新名詞，偶後相關的歷史書寫，基本上也無法不提到曾國藩和他的湘軍。

本文並不打算進行「曾國藩研究」或「湘軍研究」，寫作動機乃是出於以下的假設。無論針對曾國藩或湘軍，一般人（而非學術研究者）之歷史認識多半不是來自正式的歷史學術論著。其中一部分較為有心的讀者，其歷史知識則可能取自一般的斷代史，或者更具體而言來自中國現代史；所謂「一般」的現代史，是指原則上以一本的篇幅厚度大致涵蓋之現代歷史，理論上它的內容應該比通史來得更詳盡一些，但又絕對遠比同一主題的專門著作或專書來得更簡略。多數的讀者基於個人興趣或時間分配，充其量只能從一兩本現代史當中取得某些事件的基本印象，這些基本印象應該不致有太大的失誤，如果該書作者遵循歷史寫作之專業規範的話。一旦更進一步涉獵相關的專書，則專書對於同一主題之更深入、也更廣泛的歷史紀錄，有可能讓讀者更能接受，或者反過來修正了現代史的評述，畢竟現代史基於篇幅所限，只能以凝練的筆法濃縮事件的來龍去脈，這不一定是現代史作者的「過失」。

基於此，如果專書層次的歷史可能影響現代史給予讀者的基本印象，我們若能在現代史、專書兩個歷史層次之下，再以更接近底層的史料來比對或回溯現代史的印象及專書的具體論述，歷史的認識又可能會發生何種變化呢？乍看之下，這個問題的答案也並不難推想，即是底層史料可能讓我們再確認、或者修正前兩個層次的歷史。但這恰好不是問題的結束，而是問題的開始。

貳、歷史層次的合理性

歷史是關於過去發生之事實的各種書寫，不同書寫方式之本身，又使得歷史的

¹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冊（台北：曉園出版社，1994），頁127。



意義充滿分歧。即便表面看來最簡單的區分，例如依人類活動之功能而將歷史區分為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水利史、工程史等等，細究之下各類文本之間也彼此重疊與交織，甚至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新興的「社會史」，除名稱之外，其內涵在歷史學界也沒有共識，論者甚至主張不包含經濟史的不叫社會史。² 此外，依據原始資料或二手資料而寫就之歷史著作，甚至不同的二手史書之間，於知識的權威性上也存在著階層（*hierarchy*）之爭，這同樣涉及何謂歷史之根本問題。³ 如果再依時間跨距（*time span*）而言，布勞岱（*Braudel*）則區分歷史為短期事件、中距的和長時段的歷史視野，主張後者較可看出所謂歷史的「結構」（*structure*），歷史學家較不易被當下發生的事件所俘虜。⁴ 歷史理論之分辨與爭議不可盡書，然而與本文相關的，則是歷史書寫的「層次」（*levels*）問題，而層次問題也須回頭牽涉到時間跨距的規格侷限。

許多歷史的撰寫，並非單單將歷史材料按照時間先後排列下來而寫成「敘事體歷史」（*narrative*）而已，其中或多或少包含了某些首尾一貫的故事或主要情節來貫穿其中。許多事件發生的當下或許帶有爆炸性，但是當歷史書寫跨越了幾個世紀，依布勞岱的說法，作者有可能在眾多事件之下發掘出歷史「更深層的運動」（*profound movement*），而同時可以運用這些更為基本的長期規律，來掌握眾多事件之間的整體連鎖關係（*Whole chain of events*）。⁵

然而，後現代歷史觀對上述說法表示懷疑。懷特（*H. White*）認為歷史學家跟小說家沒有差別，二者都在從事虛構的工作，因為他們都是依照文體本身的邏輯規則在製造「文學作品」。⁶ 性質既屬「文學」作品，則我們若欲將之視為歷史事實，則作者和讀者都可能陷入某種自我陶醉之自欺。傅柯（*Foucault*）則主張人間的歷史其實儘為「理念史」（*history of idea*），作者透過其個人（或受時代影響）的特定理念而將歷史編織成為不移的事實，甚至此一歷史事實以真理的姿態登場，則面對歷史的我們，就必須反過來質疑我們自己的「真理意志」（*will to truth*）；在知識的生產上，真理意志雖然扮演著的積極的角色，但真理意志卻也催促我們在論述之上追尋某種持續而不中斷的（*uninterrupted*）、或沒有被明說的（*unsaid*）另一理念世界，再由此理念世界削足適履地詮釋真實世界的一草一木，因此傅柯才會反過來強調論述（*discourse*）之本身，在方法論上堅持「論述必須被當作不連續的活動（*discontinuous activity*）來對待。」⁷

²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黃煜文譯，《論歷史》(On History) (台北：麥田出版，2002)，頁 133。

³ Arthur Marwick, *The Nature of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0. pp.131-132.

⁴ Fernald Braudel, *O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27-34.

⁵ Braudel, F., *On History*, p.28.

⁶ 彼得柏克(Peter Burke)，江政寬譯，《歷史學與社會理論》(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台北：麥田出版，2002)，頁 249。

⁷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p.229.



為避免閱讀削足適履之風險，本文安排了個層次的歷史閱讀：現代史、專書，與曾國藩的家書，放在一起相互照應。本文無意評斷這第三層的底層歷史（家書）將以何種客觀的普遍規則，影響前兩層歷史的論述；歷史著作包羅萬象而性質殊異，作者只依個人興趣與學術專長，把自己先當作一名讀者，然後單就曾國藩與湘軍這個主題，並列現代史、專書和家書三個「主體」，而試圖進行個人的一場「不連續」的解讀而已。⁸

之所以挑選曾國藩的家書來與現代史及專書相互對照，作者的動機大致如下。首先在下筆的起心動念上，如果現代史難免帶有一定跨距之時間視野下的評斷，而專書乃是拉開傳主的一生、細觀事件起滅之「事後」的議論，則一封封的家書只是把最近發生的大小雜務，做個平鋪直述的報告而已，在歷史時間上只是「當下」，下筆書寫之際，原則上應無更大的「系統化」之野心。如果把當下眾多而無心之雜務記述累積起來，對照現代史或專書的蓋棺論定之言，或許可以特別就其落差，而推究歷史現場之實際情形。其次，幸運地，曾國藩非常喜歡寫信，不只書信數量龐大，而且他超過兩百封的家書都不是潦草簡短的噓寒問暖，而是長篇累牘不厭煩瑣地暢談許多生活、交友、讀書及戰場上的具體細節。特別是戰場第一線所發生的平常事務，或許因其平常細瑣而日日重複，或者因為內容與史家之定論不符，而被歷史學家認為「不重要」，但是這些史書所不及的具體細節，卻可以讓我們重估曾國藩領導湘軍對太平軍展開作戰的真實過程，可再用來對比較代史與專書所傳達的意象。當然，寫給家人的信函原則上屬於不公開的文件，曾國藩有時也在字裡行間發洩自己的情緒；個人的評論不能說它不受到主觀感受或個人價值觀的影響，但終究那是由他個人眼中看到的湘軍與自己，與後世歷史學家之「看見」相比，至少也有其互別苗頭的樂趣。

當然，試圖由歷史來理解過去，難免將遭遇一個無法避免的事實，那就是窮人、弱勢者或真正底層人物留下的史料既稀少又簡略，而同時史料的蒐集也不可能全面涵蓋，歷史學者出於個人興趣或問題意識而搜羅相關的、而且是他們認為較重要的史料之外，歷史上的特出菁英（例如曾國藩）之所以會被後人撰寫，很務實的原因之一即是他們的史料相對豐富。因而，所謂歷史材料（**historical material**）可能從一開始就存在內在的偏誤（**inherent bias**）。假設人間全部層次的全部的史料都被蒐集齊全，結論有可能大不相同；一如考古學涉及的全部資料若更齊備，其結論可能也會改變。⁹

本文無意把家書視為「原始」（**primary**）史料，進而將這「原始」史料的價值

⁸ 此謂歷史的三個層次，當然是作者為了服務寫作目標所進行的刻意布局。嚴格來講，歷史本身原無層次可言，而且家書也不算真正的「底層」。所謂「最底層人物研究」（**subaltern study**）試圖記錄殘存之最底層小人物的記憶，然而對於曾國藩或湘軍這個主題，已經很難如此從事；另，年鑑學派的鉅著往往博大精深，試圖同時掌握長時段的視野與最日常而基礎的細微事實，也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⁹ Geoffrey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in History*,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91. p.56.



懸於現代史或專書之上。在歷史編撰過程中，即使是最原始的手稿史料，在特定議題的處理上，有時不必然會比其他歷史論著更有價值，因為前者可能是事情發生過程的真實描述，也可能是作者自己很有信心認為事實就是如此，也有可能只是奉命書寫，或來自集體決議，甚至也有可能是自己揣測發明的。¹⁰ 反之，現代史或專書的撰述高度或者所謂的「後設」(meta) 立場，也可能有機會開展出某種洞悉全局之深刻見解 (insight)，其價值也不容忽視。無意陷入「何謂歷史」之爭，本文旨在透過單一主題之三層歷史閱讀，而正視人間意義的多重並存。

不過，即便宣稱為三層歷史閱讀，作者對於曾國藩家書其實是有所偏愛的。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雖然預設了某種終極的「理性」(Reason)，但黑格爾其實不是這麼單純的把理性當作研究上的一種預設 (presupposition)，而毋寧把它視為理解歷史之後的某一結果 (a result)；他認為對於歷史「必然方向」的理解，來自「歷史本身必須如其然 (as it is) 來對待；我們必須歷史地、經驗地 (historically, empirically) 來進行」¹¹。歷史地和經驗地進行理解，則抽象歷史化解成不同層次的歷史之後，不同的歷史層次可能各有其不同層次的合理性 (rationality)，或者反過來說則合理性亦有歷史層次之分，未宜執一而終。在相對簡明凝鍊的現代史中，抽象概念或語言之本身當然有助於我們掌握歷史，甚而以為自己「已經」掌握了歷史，這種心境不可否認也屬人性需求之一。然而，若能在語言概念之下觸及日常生活的具體實踐，則更可能讓讀者學習包容人性各層次、事物各層次合理性之平凡存在，如其然，而歷史地、經驗地存在；縱使讀者從現代史讀到專書再讀到家書之後只能掩卷嘆息，不再如往日那般篤定，但對「真理意志」多了一份警惕，那又何嘗不是一種自由。

參、現代史到專書之一瞥

幾經猶豫，曾國藩終於願意出面正式組織湘軍對抗太平天國，但對於太平天國運用的漢族民族主義號召，曾國藩則刻意迴避。事實上傳聞太平天國「有勸國藩勿忘種族之見，乘清之無能為，為漢族謀光復」之進言，而被曾國藩掩匿。¹² 此中雖有曾國藩的難言之隱，然驗諸許多現代史之著作，可知曾國藩最核心的動機，乃是眼見太平天國對整個儒家秩序的褻瀆與猛烈攻擊而大為驚駭所激，因而曾國藩編練湘軍，其將領一律來自通曉軍事的儒生，這些儒將則響應曾國藩的宣示「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旁觀」。¹³ 面對來勢洶洶的太平天國，曾國藩採用的根本對應之道，乃是「以古來就確立的方式—重振道德」來消滅它。¹⁴

¹⁰ Marwick, A., *The Nature of History*, p.133.

¹¹ Charles Taylor, *Hegel and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65.

¹² 孟森，《明清史講義》(台北：里仁書局，1982)，頁 696。

¹³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129。

¹⁴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薛絢譯，《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 (台北：



至於湘軍招募的士兵，則必須能夠吃苦耐勞，以「樸實而少心竅」的鄉農為尚；編制上十到十二人為一隊，八隊為一哨，四哨為一營，一營約五百人，下級與上級的關係「皆如子弟之視其父兄」，且逐日苦心精練，「不僅針對綠營之弊，亦須兼取敵人之長，成為確能戰鬥的部隊。」¹⁵

雖然有別於傳統八旗綠營，但湘軍之「新」，卻也得放在歷史長河中加以整體遠觀與比較。在時間上，太平天國內戰時期與美國 1860 年代的南北戰爭相互重疊。然而，中國戰場上的軍隊行進靠徒步，後勤供給靠當地資源，軍中沒有醫療隊伍隨行，沒有現代地圖與發報機，攻城仍靠人力挖掘地道引爆火藥，水戰靠帆船或舢舨，火槍極少使用，基本上仍是刀槍棍棒短兵相接的肉搏戰。因此相對而言，美國南北戰爭乃是工業化時代的第一場大戰鬥，然而太平天國與湘軍之戰卻是屬於前現代的最後一場大戰鬥。¹⁶

在這般「前現代」的處境下，著手編組湘軍的大原則（也是道德原則），即是由曾國藩先選擇性格與信念與自己相近的人擔任將領，再由將領依相同原則選擇下屬軍官，軍官再選募士兵，湘軍整體領導風格與組織文化，皆從屬於「個人對個人」的關係網絡，大家相互依賴而相互支持，「這乃是將家庭制度中，人人按其身分相互負責的精神，搬到軍事上來運用。結果效率奇佳，團練的每名兵士都是清白樸實人家的子弟，訓練精良，糧餉充足。」¹⁷ 湘軍之所以糧餉充足，原因之一是清政府同意湖南可以自設關卡自行取稅，通稱為釐金。

湘軍成軍過程中，曾國藩扮演的角色至為關鍵，因為這是由曾國藩和他自己的弟弟們，協力統合及其他鄉紳組織而組成的隊伍，動員而來的是「強悍農民鄉勇，造就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因此「湘軍的成立，代表地方團練在抵抗太平軍的無比彈性與精銳戰力」。¹⁸ 不過，湘軍初期的戰果其實甚為苦澀，也吃過好幾次敗仗；歷經幾場苦戰而終於有較大規模的勝利之後，曾國藩和各將領經驗也豐富了，「湘軍之氣始揚，自信必可任征討之任矣。」¹⁹ 同時，亦有論者整理湘軍之所以能消滅太平軍的原因有三，一是將領均為深受儒學薰陶的知識份子而忠君觀念深厚，二是湘兵純樸忠誠且待遇較當時一般工人要高出十倍，三是曾國藩訴諸太平軍破壞鄉土、拆毀廟宇、廢除私有土地等事蹟而引起廣泛同情。²⁰

正中書局出版，1994），頁 234。費正清著作之《中國新史》看似接近通史，就篇幅比例與論述詳略來看「本書的主旨事實上仍在於闡釋近代中國的發展」（見該書之余英時序），本文將之列屬現代史。

¹⁵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127。

¹⁶ 費正清，《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頁 230。

¹⁷ 費正清，《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頁 234。

¹⁸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2001)，頁 220。

¹⁹ 孟森，《明清史講義》，頁 674。

²⁰ 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1989)，頁 114。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亞洲各國的史觀大多瀰漫民族解放之主旋律，而中國的史學界更特別強調過去的帝國主義侵奪與農民起義，這種現象分別受到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強烈影響。就其正面效益來看待，這樣的新史觀促使中國更重視以往不甚被注意的經濟史，同時也於 1949 年共產中國成立之後能夠以新的官方史觀取代了早在五四運動之時就已被拋棄的傳統儒家史觀。²¹ 當史觀之座標大物換星移，則對比可知前段引述之現代史論述都是以湘軍為「主角」，而它的「敵人」乃是太平天國。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下，太平天國之起事被尊抬為「農民戰爭」，且「以疾風暴雨之勢，雷霆萬鈞之力...沉重打擊了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在中國歷史上寫下光輝不朽的一頁」，如此一來則湘軍不過只是以「地主團練為骨幹」的「軍閥武裝」而已。既以太平天國為主角而以湘軍為敵人，則敘述內容常見太平天國將領如何「誘敵進入包圍圈」而「各路太平軍趁勢對敵圍殲痛殺，敵軍拚死突圍，終不得出」，「敵人對此十分恐慌，驚呼顧此失彼，疲於奔命」，或引譚嗣同描述湘軍攻入南京之後「見人即殺、見屋即燒」之惡行，使曾國藩和湘軍的整體模樣顯得不堪之極。²²

以上是依若干現代史來回顧曾國藩與其湘軍的大致形象，以下則以相關的專書來繼續討論。

現代史層次之下是專書，但本文對於專書本身並無特定的認定標準，舉凡針對曾國藩或湘軍而寫作的著作，包括單一書冊或學術論文皆是。由於寫作篇幅的放寬，專書作者更能暢所欲言，雖然特定意識形態主導下的敘事一貫性可能更為彰顯，但也可能容許主旋律之外的異音旁觀其間，基本上越接近嚴格意義下的學術著作則相對嚴謹而持平。

沈惠如的《曾國藩》是一本通俗的著作，其副標題「立功立言一儒將」已將其立場清楚標明，筆下的湘軍素質純良、編制良好、訓練得法、幹部適當、糧餉充足、內部團結，但對於曾國藩嚴酷、甚至弑殺的一面也並不掩飾，只是以「亂世用重典」為由輕輕為之辯護。²³ 立場相反的著作則屬史浩的《反說曾國藩》，以言行不一、用人唯親、丟棄仁義、名利至尊、常敗將軍等負面角度「還原」曾國藩；同樣引述歷史事實，全書以通俗白話夾議夾敘，把曾國藩從所謂「千古完人」的地位拉扯下來，曾國藩不過另一名庸俗政客，湘軍也只屢戰屢敗，最後僥倖獲勝而已。然而非常有趣的是，該書作者在其序言中委婉寫道「曾國藩所處的時代也不允許他成為這樣一個完人.....政治的風浪把他打得體無完膚，戰爭的磨礪又將他變得狼狽不堪，他竭盡全力走完他所能走完的人生，給人們留下了幾多感嘆，幾多沉思」。²⁴ 同時於曾國藩「可鄙」的一生保留其「可敬」但又不可說的同理心，最後只能以「可嘆」

²¹ Geoffrey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in History*,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91. pp.139-137.

²² 龔書鋒、方攸翰主編，《中國近代史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2003），頁 86-107。

²³ 沈惠如，《曾國藩》（台北：幼獅文化，1991），頁 42。

²⁴ 史浩，《反說曾國藩》（台北：吉根出版，2005），序頁 6。



收筆，史浩把曾國藩描述成一個「思想矛盾的可憐人」²⁵，但面對曾國藩一生，作者本人為何不免也思想矛盾？

何貽焜的《曾國藩評傳》屬於學術著作，以編年的方式分別解說曾國藩的生活、思想、政治、哲學、軍事觀，參考之史料豐富而紮實，部分也包括了曾國藩的家書，嚴謹地編寫湘軍與太平軍的作戰過程。何著亦觸及曾國藩個人的自我評論，包括曾國藩自己坦承「國藩於用兵行軍之道，本不素講，而平時訓練，所謂拳經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麥之不分」；但是曾國藩之終究能夠擔當大任且贏得最後勝利，主要原因之一來自曾國藩本身絲毫不敢鬆懈於自我教育，隨時學習而不斷成長的結果。²⁶ 對照《明清史講義》引述李秀成與太平軍將領直言「曾國藩善用兵....將來再困天京，必此人」²⁷，自評與他評相提並論，讀者對曾國藩軍事將領的形象，應有更複雜、但也更深入的領會。然而曾國藩本身之自律甚嚴與不斷進行身教言教，真能使湘軍全然風行草偃嗎？家書的文字坦言「凡帶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²⁸，曾國藩的領導實況，已然躍乎紙上，但由於敘述簡略，讀者不一定會注意到。

此外，水師的作用值得單獨一提。湘軍與太平軍多年苦戰而獲勝，水師的作用之所以居於決勝之關鍵地位，乃是因為「這種戰鬥需要機動，甚於技能訓練」。²⁹ 此處之水師並非現代海軍，充其量只能視為一種「內陸作戰的海軍」(inland navy)而已。³⁰ 江淮一帶水路密布而四方流暢，水面上的船艦運作，最終即是爭奪水師、陸師相互配合的陸上戰機，因為水師的主要功能乃是機動登陸作戰，因而曾國藩「組織的水師其實乃是一種兩棲部隊，起居於內河帆船上，持有火器，使戰事帶機動性。」³¹ 湘軍水師的相關論文進一步詳述水師作戰、補給、訓練、編制等種種細節，使讀者對於「水師」概念有更具體的瞭解之外，也不宜遽而美化湘軍水師的優越性。不可諱言，「湘軍水師在未施訓練的情況下，即突然出發東征，而後邊走邊練，邊戰邊學」，最後才從「嘗試錯誤」中逐漸壯大成長。³² 水師之外，曾國藩本身所處的政治困境也曾被專書一一檢視，其中包含了朝廷大臣的讒言掣肘、釐金資源之被奪取、湘軍被公開羞辱、曾國藩對於自己是漢人而軍功太盛等等巨大的壓力，在其家書中亦可見到曾國藩以「好漢打脫牙和血吞」語自我勉勵，說明曾國藩「逆來順受，忍辱含垢，經過長期奮鬥，終能建立大勳，功名蓋世。此種堅苦貞定之毅力，實為曾

²⁵ 史浩，《反說曾國藩》，該書第四章之標題。

²⁶ 何貽焜，《曾國藩評傳》(台北：新文豐出版，1975)，頁95-96。

²⁷ 孟森，《明清史講義》，頁698。

²⁸ 何貽焜，《曾國藩評傳》，頁104。

²⁹ 費正清，《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頁230。

³⁰ 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7, p.80.

³¹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北京：新華書店，1997)，頁251。

³² 王文賢，〈湘軍水師的制度分析〉，《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五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121。



氏過人之長」。³³基本上通過專書的深入解析，曾國藩之人的模樣，皆與一般現代史所描繪之朝廷重臣或地主軍閥之簡單形象漸漸產生出入，湘軍的簡單形象也通過專書而更趨複雜。

肆、曾國藩家書³⁴

曾國藩出面組織並領導湘軍，為以身作則，曾國藩「吾兄弟五人，皆出外帶勇」，其中六弟曾國潢、季弟曾國葆死於戰爭之中，九弟曾國荃亦曾身受重傷。

湘軍組成之後，曾國藩的弟弟們成為各營的領導人，公務上與曾國藩互為長官部屬。曾國藩頻繁地與諸弟寫信，除了交流帶兵經驗之外，由於家信屬於私人文書，也可作為公文往來之外真正進行溝通觀念的非正式管道，實為中外戰史中極為特殊、饒富趣味的一頁。以下擷取的家書內容分為三類，一是湘軍於作戰過程中的相關細節，可能有助於後人重建歷史實況；二是曾國藩於鄉紳帶兵方面的領導過程，特別針對歷史學者強調曾國藩一手選拔的軍官「內中有很多小地主，來自曾的故里湘鄉，於是部隊間精神上團結鞏固」而發³⁵；三是曾國藩自己如何看待這場戰爭。

一、戰場上的湘軍

湘軍將領王璞山因為前一場戰役失利，帶來的鄉勇死了八十人，因而「大發義憤，欲招鄉勇兩千，前往江西殺賊」。曾國藩和王璞山是湖南湘鄉的同鄉，但曾國藩招募鄉勇是以湖南全境為範圍，但王璞山則「專招湘鄉一縣之勇」；對王璞山而言，湘鄉本地出來的兵勇才是真正的鄉親，因此招勇抗敵的目標雖然一致，但「男（對曾國藩父親之自稱）係為大局起見，璞山係為復仇起見」，可見一旦戰場相見，雙方相互廝殺一決勝負之本身，例如此處之復仇，即漸漸成為一種獨立之目的，其餘的高貴理念（包括維護孔教傳統等）恐早已不復多想。

戰場有其自身之邏輯，不是個人所能左右。鄉勇本是農村青年，在地方上可能經過基本訓練，也可能沒有；但是湘軍作為一支大規模的正規軍而從事團體作戰，需要學習的地方太多了，更何況還有後勤補給等複雜問題需要安排妥當。然而戰事吃緊之際，上級急令湘軍立刻開赴前線，此時明知「器械未齊，訓練未精」，曾國藩無法拒絕但也莫可奈何，「在勢之推移，有不自知而出於此，若非人力所能自主」，此言透露出曾國藩已感受到形勢比人強的無奈。

³³ 王爾敏，〈曾國藩經營湘軍之艱難遭遇及其心理反應〉，《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五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 228。

³⁴ 曾國藩，《曾文正公文集》（台南：成大書局，1985）。本節內容取自曾國藩寫給祖父母、父母、諸弟的書信，凡使用「」號者皆為原文，因引述頻繁，欠不隨附原書頁碼。

³⁵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頁 251。



把沒有經過充分訓練的兵勇送上戰場，就等於送死，曾國藩對於「新勇太多，實不放心」，所以他對於訓練一事確實積極要求。「余以為訓練兵勇，亦須常講常辨」，他再三囑咐各營帶兵官「認真整練，再行進兵」、「待新軍訓練已成，再行進兵可也」，這充分說明湘軍並非以兵強馬壯的姿態出動，充其量也只是邊練邊戰。至於剛到的新勇，曾國藩也非照單全收，「吾昨令營務處點名，共四千六百餘人，聞精壯者不甚多，可汰者占三分之一」；在急需大量人力的傳統戰爭中，可汰除者竟然佔三分之一，可見「招募兵勇」一詞看似當然，但這前端的程序根本就不健全。曾國藩對於水師的操練也抓得很緊，除了實際發生戰鬥之外，幾乎要求日日操練；但水師的火砲需要火藥，若遇火藥不足則「量入為出，少操幾次，以省火藥為囑」。

曾國藩名為領導湘軍，但這只是個概略的說法，單憑湖南湘軍在數量上根本不足對抗太平軍。「現擬招添練勇，俟廣西勇到，廣東兵到，再做出師之計」，「廣西水勇十八日殺祁陽勇七人，日內嚴查」，可知湘軍實為各省共組之聯軍，省籍摩擦問題也明顯存在。

龐大的軍隊需要龐大的經費，身為聯軍總司令的曾國藩其實也無法掌握，「湖北官弁兵勇，久無餉銀，真不堪設想也」，有時甚至「營中雖欠餉四月，而軍心不甚渙散，或尚能支持，亦未可知」；欠餉竟然可長達四個月，說明曾國藩在朝中並沒有得到全盤的授權與支援，故而「余統兵已近十萬，即半餉亦須卅萬，思之膽寒」。由於湘軍的待遇很好，就算戰況不利，仍有許多鄉人陸續前來投效，「事機不順而來者偏眾，可見鄉間窮苦也」，因此鄉勇參加湘軍之最基本的動機，在乎的是高額報酬，而在其他方面，因此一旦薪餉不繼，曾國藩對於十萬大軍的作戰意願也沒有把握，膽寒之處在此。

既然領餉而成為正式的軍隊，湘軍就不再是過去的地方鄉勇，許多行為規範必須從新打造，例如早起。曾國藩要求湘軍必須早起，早起才能「振刷精神」，因為「粵匪」（曾國藩對太平軍的稱呼）「其行軍亦是四更喫飯，五更起行」，而湘軍本身「起太晏，喫飯太晏，是大壞事」，曾國藩試圖從這個小地方開始振刷營規，但也「未知能做到否」。然「去年盤各營，各營皆畏慎早起」，但由於自己的弟弟較晚起床，導致整個營也隨之晚起，曾國藩趕緊去信告誡「未有主帥晏而弁勇能早起者」，「猶如一家之中，未有家長晏而子弟能早起者」。這裡也已埋伏了一個隱憂，即是湘軍的問題恐怕是在各路帶兵官身上。

太平天國起事之際，中國各地早已盜匪橫行，這是後來又爆發大規模捻亂的基本處境。湘軍是湖南人，但湖南本身也有巨盜集團，曾國藩最擔心的莫過太平軍「一入湖南境內」則湖南盜匪將迅速與太平軍合流，造成「牽一髮而全身皆動」之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湘軍一面對抗太平軍，一面還得清剿各省的盜匪。但是「真賊十餘，率土匪三百人，與我軍接仗」，「真賊」率領「土匪」，曾國藩所擔憂的事情，後



來還是無法阻止。「洪容海投誠後，其黨黃朱等日復叛」，太平軍或盜匪其實也加入湘軍；「各處敗兵潰勇，多半投賊」，這意味湘軍其實也投入太平軍。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太平軍本身已經不再是從廣西殺出來的那一批兵勇，而是沿路吸收各地勢力，自然也包括湖南人在內。因此，曾國藩處理湖南本身之盜匪問題是極其謹慎小心的，寧願借助鄉紳的人情關係將之招降收納，「萬一不然，亦須相機圖之，不可用力太猛」，以免清剿行動「過激而生變」，反而把地方勢力推送給太平軍。即便如此謹慎，許多太平軍與湘軍之間的戰役，仍然可以說是湖南人對湖南人的戰爭，曾國藩無力改變。同時也正因為湘軍內部成員的日漸混雜，軍紀問題一直也讓曾國藩頭痛不已，雖宣示「兵勇擾民，嚴行禁之」，但曾國藩仍不時囑咐各營「附近百姓果有騷擾情事否，此亦宜深察者也」。諭令「深察」，或許反映出各路帶兵官對軍紀問題恐多睜一眼閉一眼。

鄉勇在地執行任務都是小規模行動，一旦成為大軍，仍是積習難改。「此營出隊之時，未經會知彼營」，若意外遭遇攻擊則「用令箭飛請彼營前來接應」；彼營出隊接應則滿心感謝，沒來援助「則怨其不救」；但彼營也很為難，若不出隊營救則「恐惹人之怨憾，又慮他日之報復，於是不敢不去」。這種各隊自行其是，而以他隊必須配合自己之心態已然「習慣為常，視為固然」，曾國藩「力革此弊，必須與各營委曲說明」。但委曲說明四字，表示曾國藩也只能苦口婆心不斷溝通而已，因為各個帶兵官都是自己的同鄉好友，無法以軍令嚴辦，況且以當時毫無現代通訊與情報資源之大規模戰場而言，協調作戰之可能性本來也甚低。但是這場戰爭中，水師和陸師之「相依護」，仍是湘軍得以致勝的最大優勢。

水師的大小船隻皆配有火炮，但雙方大船（稱為快蟹）皆以載運兵員上岸作戰為主，雖然大船的火砲也可直接轟擊對方。水師載運兵員，適時、適地機動登陸，可與陸師協同作戰增加勝算之外，就算敵方「斷我糧道，有水師接濟，或可無礙」，功能上類似「陸路之兵，尚無糧台隨行，不能遽進」一樣。累積一段經驗之後，曾國藩對於戰船的需求越來越清楚，可直接判斷「衡州所造之船，甚不合用」。在戰法上，曾國藩也模仿太平軍的水師，「備杉板數十號，小漁划一百號，出隊開仗時，散布滿河，拋擲火毯」，除了擾亂對方船陣外，最主要的就是伺機火攻，燒掉對方船隻。雙方水師的主力都是大船，一旦大船上的兵員離開船隻上岸作戰，「每船僅留二三賊在船」則可輕易奪取，但雙方大船的處境都一樣。曾國藩自己的指揮艦就被偷襲奪去，倉皇逃命之間曾國藩甚至失去全部重要文件，當時的湘軍水師也聞風潰敗，狼狽不堪的曾國藩對此自責甚深。

水師雖是湘軍最後得以致勝的關鍵兵種，但是水師的問題是「水手易添，船隻難辦」。水戰中或者相互砲擊、或者遭到焚燒，或者「大風壞船」，損壞之船的修復需要時間，當時中國無有及時處理的工業水準，就算來自廣東善於水性的水勇補齊「也不得不稍微等候」，雖可乘勝追擊但也無法行動，只能坐失良機。另一方面，即



使「將小划乘夜放火」是個非常實用的戰法，曾國藩也面臨著另一個苦惱的難題。水勇增加，無船可用，則戰力無法增強；但船隻齊備之後卻又苦於「無人統領」，又是一個機緣不湊的遺憾。小划即為舢舨，編制 15 人，可置 4 門小砲，曾國藩大量增加小型船隻「但乏管帶小划之人」則也無濟於事；為了吸引人才，曾國藩甚至強調「打仗時並不靠他衝陣」，只要在江邊「攢出攢入，眩賊之眼，助我之勢，即屬大有裨益」，此語可謂委曲求全之至。

水師後來發展之「法制大備，然其要，全在得人。若不得好哨好勇，往往以利器資寇」。「資敵」的原因是水師官兵在湖上、河上的奮戰其實也另有紅利盤算，那就是可以搶奪對方船上有利之貨，作為自己的戰利品，因此雙方水兵莫不奮勇相互奪船，動機上已離海盜不遠。曾國藩下令「各哨官謹遵我不許搶貨之令」，敵船棄守則「一概焚燒」，以斷水勇妄想。但實效如何，不得而知。

二、曾國藩與湖南鄉儒

曾國藩的領導能力深受後人重視，因為他「以寡過克己，誠信照人，治身治心，而後治事治政治軍，皆有使人信賴之原本....固非有厚重之度者不能勝也」，因而「湘人勳業以國藩為中心，而奇傑所聚。」³⁶ 曾國藩之寡過克己，確實是其修養深厚之道德領導的基礎，但基於「同鄉、同儒」關係而形成之特殊領導風格，向來更是史冊描述的重點，甚至是亮點。

由鄉紳豪傑出來領軍，軍官之間的關係非比正規軍。正規軍軍官之間可單純以軍令系統相維繫，但是鄉親之誼、儒生之禮，卻在湘軍人際紐帶中扮演更關鍵的角色。被哥哥動員出來領兵之後，曾國葆一度想要打退堂鼓，此舉「迹近規避，導諸勇以退縮之路」則後果必然不堪設想，但曾國藩也「不敢強留」，只能寫信向父親求救，透過父親的手諭「嚴切責以大義」，最後曾國葆雖然「不敢言歸」，但曾國藩也知道胞弟只是勉強留下而已。很快地，曾國藩領會到「自己人」是一回事，但面臨重大任務與壓力，「專用本地人之有時而不可恃也。」

「霞仙訂於本月內還家。渠在省，實不肯來見。強使之來兵凶戰危之地，無人不趨而避之」；「平日至交，如.....等，尚不肯來，則其他更何論焉」，可知曾國藩的登高號召並不一定有效，「現除....外，諸事皆兄一人經理，無人肯相助者」；就算不得不跟著上前線的家中長工，此時「皆不願遠出，茲令其回里」。「李次青忽然高興帶勇」，而且已經啟程前來，但曾國藩卻心裡有數，深知帶兵之事「實非其所長」，不過信中對此沒有下文，想必該員還是前來帶兵了。「近來口糧，實難接濟，玉班之勇，可不必來。玉班一人獨來，則營中需才孔亟，必有位以置之也」，說明兵勇的數量受制於後勤條件而不得不有其限制，並不是越多越好，但真正的幹才則更需求甚

³⁶ 孟森，《明清史講義》，頁 671-672。



般。「王如一等來，廿四日始到，余怒其太遲，令其即歸，發途費九百六十文。家中不必加補，以為懶惰者戒」。曾國藩家書經常可見「辦事之手，實不可多得」之感嘆，但前述「家中不必加補」這一段文字除了說明若干帶兵之儒官根本缺乏戰爭紀律之外，「軍費」也似非全然來自朝廷預算，有時可能公私一體而難分難解，一如曾國藩與眾將領之間的關係。

正由於核心的湘軍乃是地方親友的集體組織，彼此關係血濃於水，一有傷亡則自然更則加悲痛；「葛十一於初八日在湖口陣亡，現在尋購尸首，尚未覓得」，「將來若購得尸首，當為之送柩回里」；「幫辦劉隱霞之死，老湘勇人人痛之」；「湖北失守，李鶴人之父，想已殉難，鶴人方寸已亂，此刻無心辦事」，親情甚至已影響部隊的正常指揮功能。

由於曾國藩已位居總司令之尊，鄉親已不宜直接投靠，許多人轉而前往曾國藩諸位弟弟的營中求職。得知「親族往弟營者，人數不少」，曾國藩提醒胞弟「賢哲在位」則未來可期，「冗員浮雜」則未來必敗，因此雖用人孔急，但也「宜略分別，其極無用者，或厚給途費」請他回去，如果不行，則幫他在營外租屋安置，「不使軍中有惰慢喧嚷之象」。這一段文字說明響應號召的鄉儒不一定是能夠幹事的人才，連「極無用者」都已露臉，但又不能大喇喇地喝令其歸鄉，還得在營外替些鄉儒安排住處以保留他們的顏面，管理成本非常之高。這裡又牽涉出曾國藩漸漸領會出來的用人之道。明知儒生不一定是軍事幹才，曾國藩也退而求其次，強調機會教育與人才培養的重要性。「杏南而外，尚有何人可以分統，亦須早早提拔。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滿意之選不可得，姑節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嚴格的自我教育與對部屬勤勉地進行機會教育，曾國藩很清楚，這是他唯一的機會，因為他不是帶領正規的軍官。

曾國藩一針見血地指出，湘軍的根本問題在於「用紳士不比用官」。

鄉紳本來無職無責，而今願意挺身而出，「貴在獎之以好言，優之以稟給」。事情做得不錯，「則痛譽之」；事情沒幹好，則「渾藏而不露一字」，事後只有一個辦法來修補，就是「勸」而已。得知弟弟們竟然公開「揚紳士之短」，曾國藩趕緊告誡他們，此舉「大失用紳士之道，戒之慎之」。不過，上場當軍官的讀書人要如何與基層的湘兵相處，也有讀書人自己必須要放下與謙卑學習的地方。曾國藩強調，帶領兵勇第一要義就是「耐煩」；發現弟弟的來信中，對與「粗鄙下等人」相處已有「又豈吾心之所樂」之言，他立刻指出「此已露出不耐煩之端倪」而苦口勸戒之，相信這也是許多讀書人軍官共同的心態，也是曾國藩編成湘軍並實際作戰之後才發覺的經驗。基於這樣的體認，日後曾國藩對於號召鄉儒一事變得更加審慎了，「兵凶戰危，一經帶勇，則畏縮趨避之念，絕不可存」，太平軍「恐非一二年所能掃除淨盡，與其從事之後而進退不得自由，不如早自審度，量力後入」。



包括曾國藩在內的讀書人軍官，之前非常可能讀過傳統兵書。讀兵書與實際帶兵打仗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經驗，然而讀書人的缺點之一，正是輕信書本上少數的軍事格言，而誤以為自己很會帶兵打仗，甚至連戰爭之事也不免「文人相輕」。「弟論兵貴精不貴多一段，實有至理」，但曾國藩趕緊提醒他，外濠、內濠的守備距離有多長，相應需要的人力就應有多少，同時還得考慮到人員的換班需求，所以人員的估算必須從寬，懇請「弟從此著想」，在毫無重話的和緩叮嚀中推翻了「兵貴精不貴多」格言的片面性。

在軍事家這樣的地位上，曾國藩畢竟是被肯定的。曾國藩本身絕非軍事天才，他的軍事領導能力其實也是拿讀書求真的精神，挪用到軍事知識的自我學習上，逐漸充實而來。然而自我學習的前提，則需要承認自己學養的不足。「沅弟言我仁愛有餘，威猛不足」，曾國藩照例先坦承自己的缺點，然後再嚴正提出他的務實提醒：「所以不能威猛，由於不能精明，事事被人欺負」，此言正是針對儒將的通病而發。曾國藩本身確實以身作則，他雖是總指揮官，但舉凡紮營距離、圍牆高度、作戰陣法、壕溝深度、大雨對於濠溝的影響、火藥性質、戰船規格等等細節，他都有深入而「精明」的了解。「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闕一不可」，曾國藩特別警告「但講闊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顛預，毫無條理」，此言之針對性不宜明講。曾國藩心中真正的儒將形象，表現於下：「季弟天分絕高」，然而「辦理營中小事，教訓弁勇，宜仍以勤字做主，不宜以命字諭眾」。軍事命令固然可壓倒群倫，但仍「望以講求將略為第一義」；何謂「將略」呢？簡言之，就是「勤」，勤就是精明之本，因而「點名看操等粗淺之事，必親躬之；練膽料敵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這裡看不見一般所謂運籌帷幄之談笑用兵，只見躬親，只見苦思。

以上這番話看似規勸弟弟，但是曾國藩的弟弟在湘軍中無疑具有某種代表性，曾國藩可能也希望透過弟弟對於其他軍官實施再教育。彷彿某種潛規則似的，在講道理之前，曾國藩總是先拿自己開刀，「我生平坐犯無恆之弊病，實受害不小」，細數自己當個翰林本應重視詩字，但總喜歡涉獵其他領域的書籍；專研理學，心裡又放不下文學；專攻水軍戰法也不夠專心，「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相關知識因為不夠持恆而未能精明到位。「現在帶勇，即埋頭盡力，以求帶勇之法」，「日所思，夜所夢，舍帶營之外，則一概不管」，否則也將「百無一成」。「書雖不可不看，弟此時以營務為重，則不宜常看書。凡人為一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精神有限，宜全用於營事也」，將來若兵事舒緩才「可以偷看書籍，目前則須極力講求濠工巡邏也」。戰爭關乎眾人的生死，原本日思夜夢四書五經的讀書人帶兵上陣，而今日思夜夢補強學習大小軍事知識都恐怕來不及應付，當然必須在軍事上「埋頭苦讀」，這才是「修己以敬」之真正的儒家風範。

曾國藩是個非常重視細節的將領，相關細瑣之事「苦口教各營官，又下札教之」，但「各營官總不能遵行，季弟於此事，太不肯認真」；連自己的弟弟都不理會，自然



「各營不甚聽話」。關於軍隊的陣法，特別是太平軍的陣法，曾國藩不斷訓誡教導之外，還親自把相關陣法畫成圖形寄給各營官，雖有營官回信表示留心，但「璞山並不回信」，「季弟回信，言賊了無伎倆」，落敗之後曾國藩只能以重話抱怨自己的軍隊「無膽無藝，任憑好陣法他也不管，臨陣總是奔回，實可痛恨」。當曾國藩的「徐徐教育」無法換來預期的回應，再加上戰機不順，他自己也會有脾氣暴躁的時候。古人脾氣暴躁，多以肝火太旺來抵罪；「余近日肝氣太躁，動與人多不合，所以辦事多不能成」。「澄沅（曾國藩之四弟）近日肝火尤旺，不能為我解事，但為我添許多唇舌爭端」。苦戰多年未分勝負，曾國藩感慨萬千，「軍中多一人，不見其益；家中少一人，則見其損」，有時真的很想讓直接對這些弟弟們說「以後儘可不來營」。

三、曾國藩眼中的戰爭與自己

十四年的血腥戰爭造成千里赤地，不管敵方我方，總是「兵差過境，恐...不無一番蹂躪」，「吾輩不幸生當亂世，又不幸而帶兵，日以殺人為業，可為寒心。」除了檢討自己「兄不善用兵，屢失事機，實無以對聖王」之外，「現雖屢獲大勝，而愈辦愈難，動輒招尤」，書寫家書成了曾國藩宣洩壓力的管道，甚至仿效他母親的口氣，他母親也曾指著自己的肚子說「此中蓄積多少閒氣，無處發洩」。總之，曾國藩最後的評估是無論如何「嗣後總以不帶勇為妙」，因為多年的閱歷，曾國藩已「知此中構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大戰方酣，水深火熱而不見曙光，身為總指揮的曾國藩自己其實毫無獲勝的把握，只能益發仰望天意，「大亂之弭，豈盡由人力，亦蒼蒼者有以主之耳」。然而「天意茫茫，正未可知」，自己雖「用心尤甚，夜不成眠，常恐耿耿微忱，終無補於國事。然辦一日事，盡一日心，不敢片刻稍懈也」。給家人的信函，吐露了曾國藩內心的巨大壓力，但他也只能把壓力鋪寫在家書紙卷之上。

最後，終於勝利了，但「各營應撤二萬人，資遣尚無著也」。

伍、結論：問題無法逃避也無法解決

一般讀者面對歷史，很習慣追問誰是「好人或壞人」(good guys and bad)，一如面對資本主義也同樣追問它的好壞或資本家是否合乎道德嗎？或許這不啻問錯了問題，至少對歷史學家而言。無論為資本主義辯護或是攻擊它，歷史不能忽視某些更為核心的議題，這些議題包含資本主義究竟是如何改變一個經濟體，它又是採取甚麼樣的形式，以及它對於整個社會有何影響等等。³⁷ 確認實況 (actuality) 應該要比作者本人的「將心比心」(projection) 更重要，因為「真正的道德使命，也至少需要對於真實世界 (the real world) 有一番了解。」³⁸

³⁷ Oscar Handlin, *Truth in Histor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1979. pp.333-334.

³⁸ Handlin, O., *Truth in History*, p.352.



本文從家書內容來觀察曾國藩和他的湘軍，至少也是「對真實世界有一番了解」之些微的努力。然而從通史到專書再到家書，歷史書寫的層次遞降，從前者斬釘截鐵之一言凝鍊到後者之具體細節委委曲曲，曾國藩和湘軍的模樣，反而由原先的清楚確定，轉而漸漸模糊而至不確定。客觀而言，家書作者曾國藩一樣有他自己的好惡觀點，相對於其他歷史書寫，這類史料之本身不一定殊勝；特別是如果我們再能掌握到湘軍基層士兵的「回憶錄」，這份歷史的不確定將會更加減少，還是反而增加？本文不願涉入「何謂歷史」的泥沼，但是這個問題終究不容逃避。

暫擱後現代史觀對於傳統史學的批判，至少從「務實的實在論」(practical realism) 觀點看來，文字的意義即便不與外在世界完全相符，但也非僅吾人腦海中自我想像，歷史仍然必須堅持真確與完整，歷史學者仍然願意爬三百級石階進入修道院翻查檔案，但同時也接納這試探性地、而且也不完美的紀錄。³⁹ 然而，這務實的實在論也是出自歷史學者自省之後的調適結果，一如專業歷史學家也不忘提醒自己「論著和論述」的差別，「目的性、實用性過於彰顯的論述，適用於論戰、運動，卻未能成就嚴謹的史學論著」。⁴⁰ 在嚴謹歷史學者的歷史中，人性、合理性與環境交織成初春時分之叢巒疊翠、顏色駁雜的巨大山嶺，歷史學者獨自站在山腳，向上遠眺，最後也只能長嘆「畢竟多數的歷史研究，充其量只能引起一些書齋裡的騷動」。

41

對於一般讀者，他們需要、也滿足於「適用於論戰、運動」的歷史，歷史真理就存在於讀者所「選擇相信」的那一本現代史中；在各自的史書裡，曾國藩和他的軍隊、蔣中正和他的軍隊、日本天皇和他的軍隊、毛澤東和他的軍隊、謝雪紅和她的軍隊，存在著形形色色的主題公園可以立即消費，但卻沒有高拔巨大、顏色斑駁的山嶺可以遠眺興嘆，或者引起一些騷動。何謂歷史，嚴謹的歷史學者認為這是一般讀者應該警覺到的大問題。殊不知這個大問題，只發生在嚴謹的歷史學者身上

³⁹ 艾坡比、亨特、傑考(Joyce Appleby, Lynn Hunt & Margaret Jacob)，薛絢譯，《歷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台北：正中書局，1996)，頁 228-231。

⁴⁰ 李孝悌，《歷史的真相》，序頁 7。

⁴¹ 李孝悌，《歷史的真相》，序頁 7。



History in Letters to Family Tseng Kuo-Fan and his Hunan Army

Chih-Shiang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Ordinary people are not professional researchers, their knowledge of historical events usually doesn't come from formal historical writings. Among such writings, relatively, concise modern history may be the most popular resourc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al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this paper arranges three levels of history, which are modern history, professional historical book or paper, and family letters of Tseng Kuo-Fan, to focus on the same topic "Tseng Kuo-Fan and his Hunan Army". By comparing three ways the same story goes, private letter to family would reveal some record which may be discontinuous to the image derived from modern histories and books. Such "three-level historical reading" offers the possibility to retrieve our historical knowledge. However, this way of reading is not affordable to ordinary people. "What is history" would, perhaps, be eternally problematic to any human society.

Keywords : Tseng Kuo-Fan, Hunan Army, Letters, Histo

